

特约专稿

引用:邢玉瑞.《黄帝内经》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思考之二——《内经》哲学方法与其他内容研究[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6(6):1-7.

《黄帝内经》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思考之二^{*}

——《内经》哲学方法与其他内容研究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摘 要:通过对古今《内经》研究方法与路径的系统梳理,总括为考据学、语言文字学、诠释学、医学理论、临床医学、哲学方法论、学术史、多学科与文化研究、不同医学比较研究等十个方面。此处对哲学方法论、学术史、多学科与文化研究、不同医学比较研究等概况予以述评。

关键词:黄帝内经;研究方法;研究路径;述评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23)06-0001-07

DOI:10.13424/j.cnki.jsctcm.2023.06.001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Pathways of *Inner Canon of Huangdi* (Part 2) —A Study on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s and Other Content of *Inner Canon of Huangdi*

XING Yurui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anxi Xianyang 712046,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paths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Inner Canon of Huangdi*, it includes ten aspects: textual research, language and writing studies, hermeneutics, medical theory, clinical medicin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cademic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medical sciences. This review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cademic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medical sciences.

Key words: *Inner Canon of Huangdi*;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ath; Review

关于《内经》的古今研究,除前文所述考据学、语言文字学、诠释学、医学理论、临床医学研究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人们又从哲学方法论、学术史、多学科与文化以及不同医学比较等方面,开展

了对《内经》的研究,概述如下。

1 哲学方法论研究

对中医哲学方法论的关注、反思与研究始于近现代,比较早的是杨则民(1893—1948)撰写的

* 基金项目: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藏象理论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陕中医药发[2018]32号);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理论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9-YL01)

《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他认为“吾人欲讨论《内经》之真价,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之见解批判之”,第一次提出《内经》的哲学基础是朴素唯物辩证法。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内经》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才得以普遍展开,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系统研究了《内经》有关哲学与方法论的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影响甚大,对《内经》乃至中医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其后这一方面的研究著作有王志全等《〈内经〉辩证法思想研究》(1983)、徐月英等《〈黄帝内经〉象、数、理思维模式》(2012)、陈全功《〈黄帝内经〉的哲学智慧》(2013)、柳少逸《〈内经〉中的古中医学——中国象数医学概论》(2016)、孙可兴《〈黄帝内经〉之辨:中医思维方法探源》(2017)、笔者《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理论与中医学研究》(2017)等。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1997)仅从《内经》与周易、《内经》与诸子两个方面讨论了《内经》与哲学的关系。《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则在第一篇“《内经》文化研究”下,讨论了《内经》“和”的思想研究,以及《内经》思维方法研究,将《内经》的思维方法总结为经验思维、整体思维、关联性思维、象数思维、模式推理与辩证思维六个方面。笔者在《黄帝内经理论与方法论》(2005)系统研究了《内经》与道家、《内经》与周易、《内经》气理论、阴阳理论、五行理论、取象思维、逻辑思维、原始思维、系统思维、顺势思维等哲学与思维方法问题。其后又撰著《中医模型化推理研究》(2021)首次提出中医模型化推理的概念,系统阐述了模型化推理与中医理论建构的关系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编著《中医哲学思维方法研究进展》(2017),对包括《内经》在内的中医哲学思维方法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总结与评述,发现就思维方法而言,象或象数思维为研究的热点,而逻辑思维研究明显不足。另外,任秀玲对《内经》类比推理系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1];吴克峰《易经逻辑研究》(2005)讨论了易学推类与传统医学的关系,提出五运六气属于易学推类的逻辑系统;王慧娟^[2]研究了《内经》的分类思维及其形成,分析了其分类思维背后的基

本假设和隐喻模型,并比较了中西分类思维的差异以及影响其形成的可能因素。

进入 21 世纪,认知科学、现象学、人类文化学等新的研究引入《内经》研究。在认知科学方面,以贾春华等《中医学——一个隐喻的世界》(2017)、石勇《中医隐喻研究》(2021)为代表,研究了以《内经》为主的中医隐喻思维,黄慧雯等^[3]还系统总结了 10 余年来中医隐喻研究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庄梅云^[4]通过认知科学的范畴理论的研究,对五行范畴体系的分类框架进行解析和推演,融合多种学科的方法,进而拓展中医学“气-阴阳-五行”双螺旋结构化思维模型,并以一种更具直观的图式结构呈现,作为中医五行学说开辟新的思维结构模型。近年来,用西方哲学的现象学知识与方法研究《内经》为一新趋势,较为代表性的学者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邱鸿钟,他以现象学分析了中医经络、命门、三焦、心神、空间概念、时间逻辑等,相关研究成果反映在其新作《中医学的逻辑哲学:中医原创思维与中西逻辑比较》(2023)之中。另外,刘胜利^[5]通过引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尝试对《内经》中几个基本观念所蕴涵的身体观进行初步的现象学阐释。认为“天人相应”观念规定了《内经》的身体是一种向着自我、世界与他人原初开放的身体。《内经》通过“气”对于“形、神”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综合而超越了近代身心二元论的思想框架,走向了一种“形气神合一”的身体观。“藏象”观念规定了《内经》的身体是一种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发生着复杂的动态交互构造的前对象整体。因此,《内经》的身体只能是一种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身体”或“气化身体”,绝不可能是近代科学或西医学的二元论认识框架所规定的解剖学或生理学身体。方向红^[6]分析《内经》中“神”概念的现象学意义,认为从胡塞尔现象学视角来看,“心神”类似于“自身意识”,“肝魂”几乎等于“内时间意识”,“肺魄”正是“动感意识”,“脾意”接近于“意向性”,而“肾志”已经完全属于“意志”了。但《内经》在“意向性”与“意志”的关系,“内时间意识”中言语行为的发生的可能性,意识与情绪的原初关联,外在世界

的客观性和实在性的证成等方面,做出了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和结论。又通过现象学分析中医五行的分类方法,对比自然态度的分类和康德的分类方法,说明五行分类的独特与科学所在^[7-8]。藏守虎等^[9]融合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理论与本土现象学资源对《黄帝内经》“情-志”予以分析阐发,认为“情”“志”分别对等于海德格尔“遮蔽”“去蔽”状态的情绪,是生命内隐与外显状态的统一。

另外,现象学与身体认知、诠释学之间密切相关,相对而言,有关身体认知与《内经》的研究相对较少。张再林^[10]通过对当代身体哲学与中国古代中医的身体思想比较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在根本理念上有诸多相契之处。如梅洛-庞蒂的“走向世界之身”与中医的“大身子”、“流动的身体”与中医的“气”、“可见的-不可见的”身体与中医“藏象”、身体的“双叶”与中医的“阴阳”、“生命化的时间”说与中医“五行”说、“身体间性”与中医“经络”、“用身体知道”与中医“身诊”相契等,这为中医身体观与当代身体观的会通及走向现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裘璐枫^[11]研究也认为《内经》和梅洛-庞蒂关于身体的理解有根本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内经》为反对自然主义关于身体的理解提供了有利证据,并充分展现出梅洛-庞蒂的哲学成果的实践价值。

纵观《内经》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虽然现代取得较大进步,但仍有一些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气、阴阳、五行哲学观对中医学术影响的利弊得失研究尚不深入,如何在发扬其方法论优势的同时,破解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局限;在思维领域,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象思维的逻辑规则问题,中医思维的基本方法还有哪些等,都有待深入探讨;新方法、新思路的引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 学术史研究

中医学术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以《内经》等经典为主的不断诠释、发挥的历史。许半龙《内经研究历程考》分述历代研究《黄帝内经》的概况(1928年),可谓学术史研究之开端。《黄

帝内经研究大成》(1997)第二编以“《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为名,分唐代以前、宋金元时期、明代、清代、近代的《黄帝内经》学术研究与发展,以及《黄帝内经》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六个章节,系统梳理了《内经》学术发展的历史。李磊等^[12]明确提出开展《内经》学术史的研究,指出《内经》学术史研究指的是关于《黄帝内经》的研究史的研究,是对《内经》的思想、学说以及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的研究。王庆其《内经学术发展史略》(2022)为《内经》学术史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哲学思想、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三部分,从历史时序的角度,溯源析流,对《内经》的学术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和反思,厘清《内经》理论在后世的传承、变化与发展,提炼学术思想,评判剖析得失,并本着“中医学术史的研究是探索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的理念,力求从学术发展的演变发展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以系统挖掘、传承学术精髓^[13]。另外,牛淑平^[14]通过对皖派朴学《素问》校诂派和注释派的综合比较研究,揭示了《素问》校诂方法在《内经》学研究乃至在整个中医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庄乾竹^[15]研究了消渴病的学术史,董尚朴《宋金元医家〈内经〉散论辑》(2021)为《内经》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刘鹏《中医学身体观解读——肾与命门理论的建构与演变》(2013),可谓以肾与命门为样本,对《内经》学术史研究的典型样例,当然该书也包含着发生学研究的内容。

3 多学科研究

多学科研究的主体是基于《内经》本体,借助现代科学的相关学科知识与方法对《内经》知识的诠释、论证与学术创新。《内经》建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仅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基本方法论,同时也充分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历法、音律、地理、农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势。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因此,借助现代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研究《内经》,也是现代《内经》研究的必然趋势。任应秋等《〈内经〉研究论丛》(1982)较早的从古代历史、哲学、天文、气象、生物、控制论等多学科开

展《内经》研究。聂世茂《黄帝内经心理学概要》(1986)、牛实为《内经生态观》(2003)分别从心理学、生态学的角度展开研究,而雷顺群主编《内经多学科研究》(1990)涉及哲学、医学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泛系分析、数学、术数、现代物理学、天文历法、医学气象学、物候学、医学地理学、时间生物医学、分子生物学、激光、电子计算机等,可谓《内经》多学科研究的代表作。《黄帝内经研究大成》(1997)第五编“《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与实验研究”,从哲学、天文历法、医学地理学、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体质学说、数学、信息学、控制论、系统论、生物全息律、阴阳气血实验、藏象实验研究、经络现代研究、脉诊多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展望等十七个方面,较为深入地阐述了《内经》的多学科研究。《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2018)分天文学、地理环境与医学、气候气象学与医学、时间与医学、体质学、数学与医学、心理学思想、社会医学思想、生态医学思想九章,概述了《内经》多学科研究的进展。另外,周波主编《〈黄帝内经〉系统解剖学和微观解剖学诠释》(2012),笔者《黄帝内经十六讲》(2018)“《黄帝内经》与系统思维”也论述了《内经》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卢倩^[16]也研究了《内经》的系统科学思想。

关于《内经》理论的实验研究,则多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相通,现代具体研究情况,可参阅笔者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丛书中的《中医藏象学术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进展》《中医病因病机研究进展》《中医经络理论研究进展》《中医体质理论研究进展》《中医治则治法理论研究进展》(202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内经》的多学科研究进展,大多还属于对《内经》理论的梳理与科学诠释,与发生学、诠释学研究有关,而基于《内经》文本凝练出科学问题,通过研究形成新的科学理论或学科则甚少,比较有代表性仅有中医体质学、中医心理学、中国筋病学等。

多学科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开展《内经》研究。如余燕达^[17]基于知识发现的《内经》肝藏象理论研究,即是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对《内经》的研究。王续琨等^[18]对1979—2020年期间以“内经”为篇名主题词的7237篇中文期刊文献的学科分类统计分析,发现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交叉科学7个科学部类都与《内经》研究相关,而以社会科学参与其中的分支学科最多,检出文献较多的分支学科有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系统论、一般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翻译学、教育学(教学论)、普通思维学等。其中也有一些属于此类研究。

4 文化研究

文化是现代人类应用最广与解释最多一个词,然对于文化是什么?则众说纷纭,大约有影响的文化定义就有近200种。李醒民^[19]认为:文化是种族的、宗教的或社会的群体的生活形式,由思想和行为的惯常模式组成,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它包括价值、信仰、习俗、目标、态度、规范等无形生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化的、仪式化的和物质化的有形生活形式。

由于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偏差,关于《内经》文化学的研究,各家认识也差异较大。比较有代表性的或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有:王庆宪《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与中国文化》(1998),分为《内经》与中国传统文化、《内经》的思维桥梁、《内经》与国民健康意识、《内经》与中国传统哲学、《内经》与医学伦理道德、《内经》与中国传统宗教、《内经》与未来医学几个方面,论述了《内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赵洪钧《〈内经〉时代》(2012)讨论了《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内经》与儒家思想、古代天文学、《周易》、道家道教、术数、扁鹊、仓公、华佗、出土医书、古代音乐以及运气学说等。赵明山等《黄帝内经文化解读》(2014),分为中国古代医药文化概论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两部分,概论部分仅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简论、《内经》的撰著、《内经》与诸子之学,但其重点是有关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王庆其主编《〈黄帝内经〉文化专题研究》(2014)可谓《内经》文化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为《黄帝内经》的文化内涵、文化渊源及价值研究、人与天地相应观、心身观、生命观、“天地人三才观”

研究概述、“和”思想研究、“治未病”思想的文化意义以及养生文化九章,系统阐述了《内经》的文化思想。但在《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第一编“《内经》文化研究”中,讨论的内容包括了《内经》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内经》的文化渊源及价值研究、自然科学成就、“和”思想研究以及思维方法研究,将有关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数学、金属冶炼、农学等也纳入文化的范畴,则值得商榷。另外,章米力^[20]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采用了“四重证据法”,通过传世文献、文字、考古材料、活态文化等证据,论述传统医学中的几个经典概念:道、阴阳、气、风、神明、身体隐喻、神圣数字“五”、祝由,以及黄帝作为有熊氏在早期文明信仰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考察《内经》中的神话历史,通过揭开以神话面貌笼罩在早期传统医学发展上的面纱,理解中国医学文化渐进的内在动力,以及它与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互相影响。

对于《内经》乃至中医的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开展文化学的研究,理清传统文化对中医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以扬长去短,促进中医学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又不能将中医学作为纯粹的文化问题加以研究,“把认知问题混淆于本体论问题,把逻辑问题误认为实在论问题,把文化差异错当自然差异,把方法差异当成客体差异,把认识结果误认成理论之源”^[21],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与劣势并存,并不是一个文化自信就能解决中医学当代发展的所有问题。

5 不同医学比较研究

《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是公认的东西方传统医学的奠基之作,它们分别孕育于东西方文明的土壤,著作时代相差不远,均为多种古代文献的汇编不仅镌刻着东西方医学的烙印,预示着东西方传统医学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CNKI可检索到相关论文10余篇。张慰丰^[22]较早开展了二者的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古代科学理论的某些共同特征,即朴素的辩证观、自发的唯物论、整体观、人与自然关系、类比归纳法、诊断方法、防治原则、天人观,而不同之处在于病理观、经络学说与针灸疗

法、血液循环思想等方面。聂菁葆^[23]研究认为二者在巫术和超自然主义观念的排除、整体观念、动态平衡思想、以临床观察为基础引入哲学学说方面有内在的惊人相似,对后世中西医学的历史发展有“示范”价值的内在差异表现在功能与实体的离合、理论解释的普适与局限、哲学和思辨的地位三个方面。《内经》和《希氏文集》的隐而不显的貌合神离,正是公元二世纪张仲景和盖仑使中医学分道扬镳、以及今天中医学差别巨大的“萌芽”或“基因”。高驰^[24]从医学内容、医学理论及医学思想三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指出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变以及医学的实体观是否彻底。赵心华等^[25]从分化论与元素论、矛盾论与机械论、抽象性与具体性、思辨性与实证性等方面,对二者的哲学思想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均来自于各自早期的自然哲学,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但《内经》主要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说理工具来阐释医理,没有完成从早期朴素的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过渡;而《希波克拉底文集》则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将医学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注重逻辑和分析的重要性,为后世医家指明了医学的实证研究方向。张建霞等^[26]研究也认为在医学与哲学的发端时期,由于中西哲学的差异,造成了古希腊医学与中国古医学分野的“暗流”,以及后来中医学治病的价值观的分歧。当古希腊医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走向注重试验和解剖的路线时,中医学将古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医学理论完善丰满,将经验医学推向极致,开始与西医渐行渐远。王志翔等^[27]研究《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对中西医学发展模式的影响,认为两种医学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的分道扬镳,形成各具特色的“贯通-传承”模式和“证否-更替”模式。刘文先等^[28]对《内经》和《希氏文集》的差异、共性以及经典照耀下的中西方传统医学道路进行了分析,以期认识中西传统医学提供新的视角。陈全功《黄帝内经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1995)列专章从哲学思想、自然对人体影响的认识、体质病理学、心理人格病理学、无神论、人体自然痊愈机能认识、

治疗原则和方法、疾病预后认识、医生应当具备的条件与道德品质、各自独有的内容等十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较有代表性。

另外,杨李琼^[29]从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对女性身体的界定和作为母体的女性身体三个方面,对《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女性身体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张福利等^[30]从后续发展潜力、实用价值取向、数学传统影响三方面探讨了二者在解剖学成就上的差异。谷莹等^[31]对二者有关疮疡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其次,也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内经》与藏医《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在 CNKI 可检索到相关论文 10 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滨等^[32-33]通过比较《内经》与《四部医典》的内容形式、哲学思想、研究方法,认为《内经》对《四部医典》有着深刻影响。张浩等^[34]从饮食民俗、服饰习俗、居处习俗、葬俗等四大方面,比较分析各具特色的藏汉民俗习惯在《四部医典》和《黄帝内经》中的展现,以此管窥民俗文化对民族医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张睿俞^[35]从心理相关基础理论、心理相关致病因素、对人格的认识、对梦的认识、心理相关诊断、心理治疗以及心理养生观等方面对两书中心理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认为是《四部医典》对《内经》理论的吸收与认同,并以改造和模仿的方式有意识地融入本土文化。仁增多杰等^[36-38]有关《内经》与《四部医典》放血疗法的理论及临床研究。

此类研究对于我们反思所谓中医原创思维,认识中医学的特征,研究中医学术发展规律及其与其他医学的相互关系,探索未来医学前行的方向,都将有所帮助。

上述方法与思路,虽然我们分而论之,但它们之间又多相互关联,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常是多法并举。如傅维康等《黄帝内经导读》(1988),其导读部分简述《内经》的书名、成书年代,论习医、行医与医德,与《内经》相关的哲学、解剖学、疾病学、针灸学、养生学、体质学说、医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诊法学说、治则学说等内容。原文部分则对所节选原文加以注释、语译。其研究就涉及

到考据学、语言文字学、理论研究以及多学科研究等方法。

参考文献

- [1] 周山.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215-222.
- [2] 王慧娟.《黄帝内经》分类思维及其形成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
- [3] 黄慧雯,贾春华.中医隐喻研究 12 年[J].世界中医药,2021,16(6):942-946.
- [4] 庄梅云.基于认知语言、心理和逻辑的五行概念范畴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
- [5] 刘胜利.《黄帝内经》身体观的现象学阐释[J].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6(2):393-424.
- [6] 方向红.《黄帝内经》中“神”概念的现象学意义[J].宗教与哲学,第四辑,2015:41-54.
- [7] 方向红,张晋一.五行如何行——从现象学看中医学的分类[J].中医典籍与文化,2021,2(1):57-69,282.
- [8] 王振国,张树剑.中医典籍与文化 2021 年第一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57-70.
- [9] 减守虎,徐胤聪.《黄帝内经》“情-志”的现象学分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1):23-27.
- [10] 张再林.从当代身体哲学看中医[J].周易研究,2016(6):59-72.
- [11] 裘璐璐.《知觉现象学》与《黄帝内经》中的“身体”概念[D].杭州:浙江大学,2016.
- [12] 李磊,王梓楠,郭薇薇,等.《黄帝内经》学术史研究:范畴、现状与趋势[J].医学与哲学,2020,41(10):72-75.
- [13] 邢玉瑞.开辟《黄帝内经》学术研究新路径[N].中国中医药报,2022-10-20-8.
- [14] 牛淑平.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3.
- [15] 庄乾竹.古代消渴病学术史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6.
- [16] 卢倩.《黄帝内经》的系统科学思想研究[D].太原:太原科技大学,2020.
- [17] 余燕达.基于知识发现的《黄帝内经》肝藏象理论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18.
- [18] 王续琨,程现昆.《黄帝内经》当代研究:多学科汇聚和整合[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157-161.
- [19]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M].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7:6.

[20]章米力.《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6.

[21]侯样祥.科学与人文对话[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243.

[22]张慰丰.东西方医学方法论辨析[J].医学与哲学,1985,6(11):1-5.

[23]聂菁蓀.《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比较研究[J].中医药学报,1989,17(5):6-10.

[24]高驰.《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比较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7.

[25]赵心华,李海峰,鲍计章,等.《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哲学思想比对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0):1291-1292,1299.

[26]张建霞,苏振兴.从医学与哲学关系的视角谈古希腊医学与中国古医学的分野:以《希波克拉底文集》和《黄帝内经》为例[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8(3):407-411.

[27]王志翔,王振华,谷莉莉,等.浅析《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对中西医学发展模式的影响[J].中医学报,2015,30(8):1148-1150.

[28]刘文先,董竞成.经典照耀下的中西传统医学模式与道路——基于《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比较[J].医学争鸣,2021,12(3):64-69.

[29]杨李琼.《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女性身体观比较研究[J].文化研究,2018(4):51-69.

[30]张福利,李志平.论《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解剖学成就的重大差异[J].医学与哲学,1998,19(8):444-445.

[31]谷莹,李海峰.《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关于疮疡认识的比较研究[J].中医文献杂志,2015,33(5):17-20.

[32]王滨,孙飞.《黄帝内经》对《四部医典》的影响[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5,11(1):37-38.

[33]王滨,乌兰格日乐.《黄帝内经》与《四部医典》的历史渊源[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5,11(3):45-46.

[34]张浩,邹纯朴.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看《四部医典》《黄帝内经》之异同[J].中医药文化,2016(5):34-38.

[35]张睿俞.心理学视阈下《四部医典》与《黄帝内经》比较研究[D].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2020.

[36]仁增多杰,仁青东主,娘毛加,等.《黄帝内经》与《四部医典》放血疗法理论研究[J].陕西中医,2014,35(10):1421-1423.

[37]仁增多杰,娘毛加,仁青东主,等.《黄帝内经》与《四部医典》放血疗法适宜病证初探[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4):999-1001.

[38]仁增多杰,娘毛加,仁青东主,等.《黄帝内经》与《四部医典》放血方法探析[J].上海针灸杂志,2015,34(7):686-688.

(修回日期:2023-06-28 编辑:巩振东)